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全文收录期刊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第 15 卷 第 3 期, 2017 年 VOLUME 15·NUMBER 3·2017

沈广明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谈起

曾 鹏 李洪涛 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培育与人口就近城镇化: 机理、关系与演化

宋树理 刘晓音 汇率的价值决定及其变化: 兼评西方主流汇率理论的重大缺陷

张嘉昕 杨巧园 西班牙蒙特拉贡合作制经济的体系构建与社会经济绩效研究

高建昆 程恩富 《世界规模的积累: 欠发达理论批判》述评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海派经济学

Journal of Economics of Shanghai School

学术顾问

刘国光 项启源 于祖尧 何秉孟 李成勋 杨圣明 吴树青 刘方棫
卫兴华 吴易风 周新城 胡 钧 魏礼群 丁 冰 张薰华 洪远朋
吴宣恭 谭崇台 陈 征 刘诗白 刘思华 高 峰 杨承训 杨玉生

主 编

程恩富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学部主任
顾海良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研究会会长

副主编

章忠民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党校副校长
马 艳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
丁晓钦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

学术委员会主任

王振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
林 岗 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
逢锦聚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

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地区和国家为序)

左大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朱安东	清华大学
胡乐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李 肿	北京师范大学
余 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白暴力	北京师范大学
侯为民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 魁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杨 志	中国人民大学	王天义	中共中央党校
张 宇	中国人民大学	郭 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董正平	首都师范大学
王志伟	北京大学	刘永佶	中央民族大学
陈 平	北京大学	周 宏	中央财经大学
曹和平	北京大学	冯金华	上海财经大学
吴 栋	清华大学	熊诗平	上海财经大学
孟 捷	清华大学	顾钰民	复旦大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派经济学.2017年.第15卷.第3期:总第59期/程恩富,顾海良主编.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642-2798-2/F · 2798

I. ①海… II. ①程… ②顾… III. ①经济学—丛刊 IV. ①F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9256 号

☐ 责任编辑 汝 涛

☐ 封面设计 张克瑶

HAIPAI JINGJIXUE

海派经济学

程恩富 顾海良 主编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中山北一路 369 号 邮编 200083)

网 址: <http://www.sufep.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sufep.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787mm×1092mm 1/16 13.25 印张 261 千字
定价:24.00 元

张晖明 复旦大学
周文 复旦大学
周建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
王朝科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刘铮 上海大学
龚晓莺 同济大学
何干强 南京财经大学
李炳炎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葛扬 南京大学
朱炳元 苏州大学
何自力 南开大学
刘凤义 南开大学
李家祥 天津师范大学
颜鹏飞 武汉大学
简新华 武汉大学
龙斧 武汉大学
方时姣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方兴起 华南师范大学
朱殊洋 广州市委党校
李建平 福建师范大学
黄茂兴 福建师范大学
庄宗明 厦门大学
周小亮 福州大学
张衍 四川大学
蒋永穆 四川大学
刘灿 西南财经大学
丁任重 西南财经大学
赵磊 西南财经大学
薛宇峰 云南财经大学
许兴亚 河南大学
张东辉 山东大学
吴宇晖 吉林大学
徐传谌 吉林大学

宋冬林 吉林财经大学
丁堡骏 吉林财经大学
谢地 辽宁大学
焦方义 黑龙江大学
李欣广 广西大学
黄志亮 重庆工商大学
武建奇 河北经济贸易大学
陈惠雄 浙江财经学院
任保平 西北大学
荣兆梓 安徽大学
欧阳晓 湖南商学院
刘子兰 湖南师范大学
王秋石 江西财经大学
焦斌龙 山西财经大学
张丰兰 内蒙古财经学院
大卫·科茨 美国麻省大学
艾尔·坎贝尔 美国犹他大学
艾伦·弗里曼 加拿大明尼托巴大学
西蒙·莫亨 英国伦敦大学
罗杰·塞夫特 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
海曼·考普 德国《马克思主义通讯》
弗里德·施密特 德国慕尼黑大学
彼特·弗雷斯纳 奥地利维也纳科技大学
让·克罗德·迪劳内 法国马恩河谷大学
里卡多·贝勒弗尔 意大利贝加莫大学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 俄罗斯莫斯科大学
伊藤诚 日本东京大学
大西广 日本庆应大学
金炯基 韩国庆北国立大学
梁春逵 越南国民经济大学
路易斯·费尔南德斯 古巴哈瓦那大学
海因茨·迪特里奇 墨西哥都市自治大学
尼迈耶·阿尔梅达·菲罗 巴西乌贝兰迪亚联邦大学

编辑部

刘晓音(主任) 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助理

主办单位

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
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
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

支持单位

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
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

目 录

论 文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谈起 沈广明(1)

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探讨 朱鹏华 王天义(13)

基于劳动价值论的资源配置分析 孙多友(39)

社会再生产最优平衡增长的平均利润率与积累率

——剑桥方程式的一个应用 陶为群(56)

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培育与人口就近城镇化:机理、关系与演化

..... 曾 鹏 李洪涛(69)

地方财政支出对该地房价的蒂布特(Tiebout)效应

——基于上海市17区县的数据 郭兴方(88)

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有效作用研究

——基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分析 马 艳 冯 璐 杨培祥(101)

绿色城镇化提升我国经济活力 刘 越 张榆新 闵路路(118)

初创期创业团队的组建与筛选 熊诗平 周卫民(135)

汇率的价值决定及其变化:兼评西方主流汇率理论的重大缺陷

..... 宋树理 刘晓音(147)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原因

——自由竞争学派与垄断资本学派的争论 王 琳 尹徐念(158)

西班牙蒙特拉贡合作制经济的体系构建与社会经济绩效研究

..... 张嘉昕 杨巧园(171)

书 评

《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述评 高建昆 程恩富(185)

探讨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力作

——《制度支柱与体制根基》简评 郭 飞(195)

综 述

马克思内生增长模型分析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研讨会综述 李 俊 杨培祥(198)

CONTENTS

Paper

Marxism; Life Science of Seeking the Happiness and Freedom	Shen Guangming(1)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Productivity and Magnitude of Commodity Value	Zhu Penghua Wang TianYi(13)
Analysi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ased on Labor Value Theory	Sun Duoyou(39)
Average Profit Rate and Accumulation Rate with Optimum Balanced Growth of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An Application of Cambridge Equation	Tao Weiqun(56)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Mechanism, Relationship and Evolution	Zeng Peng Li Hongtao(69)
'Tiebout' Effect of Local Fiscal Expenditure on City Real Estate Pri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Statistical Data of 17 Districts and Counties Basing on Shanghai	Guo Xingfang(88)
On the Effectiv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arket Economy —Based on Analysis of Yiwu Commodity Market	Ma Yan Feng Lu Yang Peixiang(101)
Green Urbanization Enhances China's Economic Vitality	Liu Yue Zhang Yuxin Min Lulu(118)
Building Model of Entrepreneurial Team for Early Stage and Designing its Assessing Scale	Xiong Shiping Zhou Weimin(135)
The Value Determination and Varieties of Exchange Rate; Reviewing the Vital Defect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Song Shuli Liu Xiaoyin(147)
Reasons for the US Economy has Being Immersed in Secular Recession after 1970s —The Debate between Free Competition School and Monopoly Capital School	Wang Lin Yin Xunian(158)
Study on the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 in Spain	Zhang Jiabin Yang Qiaoyuan(171)

Book Review

The Reviews of the Book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Gao Jiānkun Cheng Enfu(185)
Review of "System Pillar and System Foundation" —A Study of China's Basic Economic System	Guo Fei(195)

Overview

Analysis of Max's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Overview of Symposium on Mathematical Analysis of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	Li Jun Yang Peixiang(198)
--	---------------------------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 ——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谈起

沈广明

内容提要 空间是以资本为中心,还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之所在。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以利润率或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生产目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的体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共产主义信仰,以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的方式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实现人民幸福和自由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需要 需求 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 G633.23

马拥军教授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中提出,主流经济学围绕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展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围绕生产与需要的关系展开,为此他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人本经济学”(马拥军,2015:169)。从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论述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进一步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在中国道路的视野中,对需要与需求的关系特别是需要的异化和人化的关系进行分析,以阐明“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根本特征与资本经济以利润为核心的特征的对立。

一、“需要”的异化与人化

西方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偏好”,而对“偏好”的研究,则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进行的。效用价值论试图通过微观的供求关系确定商品的价值,凯恩斯经济学试图通过宏观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研究如何通过促进总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因此,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都体现出“为经济而

收稿日期:2017-05-20

作者简介:沈广明(1979-),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当代德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4年度课题“需要结构的生产和经济空间的扩张”(14BZX014)阶段性成果。

经济”的特征。与此相反,福利经济学倒是关注“需要”的满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甚至注意到某些需要异化现象,特别是在“丰裕社会”来临后,人被变为消费机器的消费社会批判,更是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靠近了一大步。但由于福利经济学未能摆脱供给—需求框架,最终成为一种改良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在生产和需要关系的基础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被当作生产和需要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特定表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存在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但仍然存在生产和需要的关系。有学者注意到,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把人类不同于动物需要的“新的需要的产生”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一个环节置于“生产”环节之后(刘珍英,2016)。匈牙利学者赫勒在她的名著《马克思的需要理论》中则指出,马克思的三个原创性贡献都以生产和需要的关系作为框架:首先,在关于资本家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劳动的观点中,劳动力的价值是以满足工人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确定的;其次,对剩余价值是通过资本家谋利的需要加以阐明的;最后,对使用价值重要性的发现,更是直接以需要的满足作为衡量标准的。在赫勒看来,“对马克思归于自己的三个发现的分析表明,它们都以某种方式建立在需要概念的基础上”(Agnes Heller,1976:23)。相比之下,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永恒的经济关系,而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关系,它以生产和需要的关系为基础,并从属于生产和需要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以供给和需求关系为基础,因此只能形成价格理论而不能形成独立的价值理论,或者说,西方经济学只能以价格理论冒充价值理论。相反,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供需平衡因而是以抽象掉供给和需求关系作为前提条件的。马克思把商品界定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由于劳动产品是用来满足需要的,而交换则需要确定交换的比例,因此马克思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建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从而为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

主流经济学驳斥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高度发达成为共产主义物质基础”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经济学本来就建立在“资源有限,欲望无穷”因而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的假定上,这表明,无论生产力如何发达,都不可能满足人的需要。对马克思的这种误解实际上混淆了“欲望”和“需要”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效用价值论将欲望设定为源动力,认为人的周围世界包括人自身具有满足欲望的效用价值,欲望和效用的互动带动着经济活动。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欲望”和“需要”是不可相等同的概念,需要可以划分为自然需要、社会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越是低级需要,越能体现出‘有用性’的特征;越是高级需要,越难以从‘有用性’方面加以界定”;欲望有两种,一种是低级的需要,即肉体需要或物质需要、自然需要;另一种是贪欲,即超越了需要的想要

(马拥军,2015:178)。马克思主义一贯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并以劳动价值论为根基阐述了实现人的幸福与自由的历史路径。它用劳动来解释事物之间相互交换的可行性,以此克服效用价值论所无法处理的人与人关系的短板。每个人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都凝结了人类的劳动。正是出于“劳动”的同一性,我的“劳动”对我有“价值”,对于他人同样也有“价值”,反之亦然。这种不同于效用价值的“价值”是劳动价值,更因它是在交换中所衍生,又可称交换价值,只有依据劳动价值,人的社会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才能获得满足。劳动和交换作为人独立于自然界的存在方式,体现了人的自由内涵,人们之间的劳动产品的交换是各自的“自由”的相交换,劳动价值实质上是交换“自由”的价值。

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基于“需要”的异化而建立的。劳动价值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商品——只是在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有剩余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时才出现,在不同生产关系中它有着不同表现样态。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需要”的异化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人的依赖性形态,需要的异化表现为奴化;一种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需要的异化表现为物化。”(马拥军,2015:179)“需要”的这两种异化都会表现为一定的价值体系。血亲关系是人的依赖性历史阶段的主导性交往关系,统治阶层几乎占有社会生产的全部剩余劳动产品,作为维持权势与生活的消费品,以致“交换”往往以极低端水平开展,劳动价值表现为附属性生产关系。但在商品交换中承当一般等价物的劳动价值——货币以其价值通约力维系并推动着交换式交往关系。以货币积累为目的来运转商品交换的群体——工商业者通过市场盘活剩余劳动产品,推动剩余劳动产品的生产。在特定历史背景与特定地区,宗法性统治机制在一些历史事件(如农民起义、民族战争等)中遭到颠覆,奴化式的社会关系处于松散瓦解状态,劳动价值的生产关系则获得发展机会,逐渐成为主导性交往关系。进而,货币取得了对劳动者和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货币权力就替代了宗法权力将人的活劳动通约为商品,投入生产中,制造业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剩余产品。货币进而就转换为资本,由此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历史阶段。劳动价值表现为以资本增殖为主导的新形态,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是这种形态的基本特征。

在此阶段,“需要”表现为物化式的异化——劳动产品同劳动相异化、劳动过程同劳动相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同人的异化、及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异化的根源来自货币的通约性和资本的增殖性,它们将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纳入物化状态中,建构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1995:108)。

“劳动”作为使人成为人、人实现自由个性的活动,恰被“价值化”为商品、货币、资本这些物性的东西,以致从自然中获得相对独立性的人又不得不依赖于这种社会之“物”的系统,成为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材料。“全部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是围绕货币价值观与资本价值观建立的”(马拥军,2015:179),在价值化存在方式下,人的“自由”则被“商品—货币—资本”机制所“劫持”,表现为自由买卖、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等依存于货币的“自由”,“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1998:42)。不难看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实质上是建基于“需要”的异化之上的“自由”。而由“自由”所衍生出的其他价值观如“民主”、“法治”等同样根源于资本、服务于资本,它们构成了资本主义异化的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价值体系是基于“需要”的人化而建立的。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意味着:“不仅货币价值观和资本价值观,就是劳动价值论,也将成为过时的东西。自由个性且只有自由个性,才成为一切价值的核心。它的客观要求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拥军,2015:186)。但只有实现“需要”的人化,这种价值体系才成为可能。如前所述,使用价值满足了人的物质生活的自然需要,但仅限于满足自然需要的人只能是抽象出的“自然人”,现实的个人的自然需要必定要在社会需要的满足中才能满足,所以劳动价值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是满足需要的重要方式,也即通过“交换”使不同人的生命力、不同人的自由可以相互共享。资本主义实质上就是劳动价值的生产关系,而且在其中“交换”的作用不仅仅是互通有无,而且在互通有无中发生着劳动价值的价值增殖,通过生产力巨大进步来实现人的自由。当然,这是为“价值”所统摄的“自由”,是物化了的有限“自由”。所以,“去价值化”就成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历史性的前提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驱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价值化”本身就孕育着“去价值化”,能够“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恩格斯,1995:390),在物质财富相当充裕的历史时期,人们并不需要以交换方式相互占用劳动产品,而是直接的共享,人们不再为了存在而去劳动,而是在劳动中存在,劳动就不再有“价值”,商品、货币及资本自行消失,“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马克思、恩格斯,2002:303)。这种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共产主义,人们在共产主义及之后的人类社会中获得了自由个性,实现了“需要”的人化。科学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是基于“需要”的人化,以自由个性为核心价值而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指导开展共产主义事业的。

二、“中国道路”如何体现“人民”取向?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运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中显现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天下’灭亡以后,中国走出‘天下’史、进入‘世界’史的道路的后半段”(马拥军,2015:57),使中国完成由“天下”之中向“世界”之中的转变。奉行“普天之下皆兄弟”原则的古代中国,与奉行以利润至上主义为基础、以弱肉强食作为生存原则的近代西方世界相遇,其必然结果是“天下”的破碎和“世界”的霸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将中国从封建和殖民的社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阶段带入通往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由于缺乏经验,中国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需要吸纳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理论方案,忽视了中国社会“一穷二白”的现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试图运用国家力量强制性推行“去价值化”,实行计划经济,结果是把共产主义事业置入挫折之境。邓小平理论的要义在于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充分发展资本的财富效应,以生产力的进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推动力,创新性地发展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条道路使中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将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中心。恰如陈学明教授所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了低谷,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破解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难题,重构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最根本的方面就是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陈学明,2014,:80)。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往共产主义的科学道路。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最终都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但是中国与西方走向共产主义只能通过不同的道路:西方发达国家是通过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是通过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曾经受到日本的影响,试图接受“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历史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内部未能形成强有力的资产阶级,外部又受到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在本应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旧制度的过程中遭到失败,被迫放弃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采取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兼具两种革命的长处,从而为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其结果是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包括英国式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国家和法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的却是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鲜明的“人民”性质,新中国只能是一个“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国家,其前途只能是走向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走向资本主义。

作为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用短短四年的时间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原打算用至少三个“五年计划”实现社会主义

改造,结果到1956年底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1956年到1976年的20年,虽然在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人均寿命等方面,中国的进步程度都走在世界前列,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背离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在经济方面走了巨大的弯路,直到新时期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中国经济才走上了“快车道”。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中国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迅速把中国由一个经济短缺国家变成了产能过剩的国家。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新常态”。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发,辩证地看待这个“新常态”。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看,“新常态”意味着供给能够满足需求,这是导致经济增长率放缓的根本原因。过剩经济的本来含义就是供给能够满足需求。但从具体褒义看,过剩有可能是产品过剩,也有可能是资本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表现为资本过剩。众所周知,资本短缺时,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润率就会走高;资本过剩时,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润率就会走低。中国的产能过剩实际上是利润率降低导致缺乏投资冲动,它并不意味着需要完全得到了满足,而是意味着碰到了需求的“瓶颈”。这就要求澄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与需求的关系:第一,需求是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需要,缺乏购买力的需要构不成需求,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说,没有购买力的需求,哪怕是“刚性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绝不能以所谓刚性需求,而必须以有效需求作为衡量标准。第二,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必须把它变为市场需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需求拉动”,但是要把需要变为需求,就必须赋予人民群众以购买力,对于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保障群众的劳动权;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必须建立福利社会制度。第三,社会主义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日益增长”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提出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单纯为资本家盈利服务的,更重要的是满足群众的需要。由更高的需要转化来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盈利而通过广告和推销等人为制造的需求,才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存在其他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诠释中国的活动。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的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从普遍到特殊、从理论到实践、从逻辑到历史的具体化生成过程。这种诠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将中华民族引领入全新的复兴取向,为思想文化注入鲜活的核心价值。但纯粹单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可能导致政治官僚化、民族沙文化及思想极端化。正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来都不是单向

的,而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伴相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在众多选择中自愿自觉地选择、接纳马克思主义并将之置于“核心”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实践的活动,所要解决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所没有回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碰到的问题,关涉中国的世界历史进程。由于“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如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辩证统一就成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在处置与国内外诸种政党的关系中如何克服一党、一国之边界,中华民族在协调内在民族关系、处理国际民族关系中如何突破民族狭隘性的局限,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思想在现代文明境遇下如何与马克思主义接轨与融合等。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跑道”与马克思主义成为“同一”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的引领者。进而如马拥军教授所言,中国就创立了新的道路,“重新接续自己的历史,把原来的‘天下’之中国转化为‘世界’之中国”(马拥军,2015:43)。

其次,国家如何具有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或者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充分吸纳被马克思、恩格斯设定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前提,国家与资本在共产主义及之后的人类社会则自行消亡。在当下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在制造巨量财富时也建构了强悍的扩张系统,以消解工人对抗性力量的方式将其吸纳在系统内,导致共产主义运动的式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属生产力水平较低,需运用资本的增殖机制创造财富的形态,必定存在国家与资本并存的客观状况。以国家替代资本的计划模式必定会毁坏生产力发展机制和制造贫穷,而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则会形成专制官僚资本并最终以腐败与战争为结局。所以国家如何具有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调和单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矛盾的产物,如果共同利益被特定阶级所强占和私有化,那么国家就失去独立性而成为虚幻的形式,它也就无法保证单个人利益的合法性。国家只有取得相对于资本逻辑的独立性,才能真正成为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的协调者。也正因为独立性,国家才具备克服资本增殖机制的异化效应及其危机风险的主体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很多难题,随着这项事业的推进还会衍生出其他问题。但在当下上述问题的确是需要突破的“瓶颈”。尽管如马拥军所析,中国的近代并不是自己的近代而是西方的“近代”。但中国不可能总是“悬”于半空,政治属性、民族命运、文化血脉必定要和中国的历史接续上而进入世界历史,也即从“天下”之中国到“世界”之中国不应该、不可能是一条断崖式的途程,这正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与资本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必定要诉诸其国家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而不是服务于资本增殖之工具。毋庸置疑,它们规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性,即马克思

所说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相统一的科学性。

三、幸福与自由：政治经济学的新指向

马拥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幸福和个性自由的科学。因此，它同实用科学仅涉及事实判断不同，包含着价值判断——‘幸福’和‘自由’都代表着特定的价值”，由于“幸福和自由”并不是纯精神的属性，“而是生活或人的生命活动的属性”（马拥军，2015：192—193），所以马克思主义是基于价值理性的生活科学。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服务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科学。与此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形式上是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表面上看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但实际上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的资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产出的科学。就此而言，它是以满足资本自我增殖的欲望为目的的工具科学。

中共八大提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目的，但却有相当长时间忽视了生产力的优先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十八大以来更是把它上升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地位。习近平在十八大之后与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上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看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这就要首先确保“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因此，习近平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②

在当今时代，如何确保把人民生活的幸福与自由作为价值目标呢？这需要置身于世界历史视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高度作出具体分析。

当今时代是由价值化系统所筑造的技术时代，资本增殖性及与之伴随的技术危机性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类头顶。在价值与技术所生成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及全球市场经济共同体已把人类链接为整体，资本的

^①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http://news.xinhuanet.com/18cpcnc/2012-11/15/c_123957816.html。

^② 习近平，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5-11/25/content_255939.html。

增殖性及弱肉强食式的侵吞效应使不同民族、文明之间矛盾冲突日益加剧。技术的风险隐患及多元民族文化的冲突已成为我们时代幸福和自由生活的两大显要威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群众的幸福与自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指向,是根本性的消除威胁、守护幸福与自由的必然选择。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取代资本中心,以幸福和自由的目标取代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在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激励下,资本驱动自然科学去挖掘“物”的原理与规律,探求多元化改造“物”的方法、全方位开发“物”的效用,以便对“物”进行技术性植入,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1995:389)。这种价值—技术合谋性与互动性的运转在现代社会已造就巨量的逻各斯主义漩涡,将人及其生活世界置于它们所构筑的矩阵中。传统道德形而上学的善良与幸福、自由与正义等主题为资本和技术所置换与裹挟,沦为逐利、战争及犯罪的话语工具。人的欲望被资本和技术聚集性地放大并代替它们承担当下生态危机的罪责。现代技术以给人类生活提供幸福与自由为借口而将人的生活浇铸成技术化世界,把人置入失却本真的危险中,如当下人们对智能机器的隐忧、对核能设施的惶恐、对生物技术的忐忑不安已透视出现代技术的压抑与威胁。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危机预警,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危险”的告示及回归思与诗的救赎之道,的确将现代人引向了技术反思之境。但要解除技术的桎梏效应,必定要找到驱动技术的“集置”能力的源动力—资本逻辑,割裂价值—技术的联姻机制。这不能依靠哲学。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只是吹响时代的号角,打赢这场人民战争需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武器弹药”。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技术的发展之所以会驱使人与自然的对立化、日常生活的矩阵化,其根子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普遍价值化,如一位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说:“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首要关注的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Andre Gorz,1980:15),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只会把人拖往技术异化的更深泥潭。只有“不是以资本为中心,不把资本逻辑作为社会的主要组织原则,不按照效用原则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的体系’,也不按照增殖原则一切都为着获取最大的利润”(陈学明,2012:17)的社会主义才能将技术的发展调拨回中性的劳动工具角色。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取代资本文明的零和游戏。在增殖冲动的驱动下,货币和资本的脱域活动获得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它将商品从原有的场所、环境、系统及时间状态等“域”中脱离出来,进行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商品域。货币和资本使自然物不断脱离原来

的存在场域,将它们聚合到市场域中进行重新配置,以商品来替代、破坏和同化自然物品,破坏原生态物品体系,切断人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系统和交往模式,将“市场”向世界复制和扩散。原有的区域性交往逐渐在货币脱域中被打破,单一民族交往走向世界历史交往,全球化的资本市场和商品交换关系已经生成。资本脱域性及其全球化效应使得价值化机制较低级的民族在世界经济系统中失去了本民族的经济掌控权甚至领土主权,以致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等被任性攫取,肇始了现代经济殖民问题,以致消极民族主义逐日盛行,成为我们幸福与自由的威胁。塞缪尔·亨廷顿把由消极民族主义引发的冲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认为这种冲突是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差异及相互碰撞的结果,“冲突的根源来自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权力关系的变化”(塞缪尔·亨廷顿,1998:252)。亨廷顿没有认识到搅动不同文明相互冲突的巨棒——资本逻辑,相反把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视为引领非西方文明的普世文明,遮蔽资本的异化效应。当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试图以暴力来封堵和消除趋于全球性的民族冲突问题,实质上只是资本力量和恐怖力量的武力较量,必定奏效甚微。要想克服消极的民族主义及其否定性的后果,只有从限制和消除资本异化效应入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寻找民族融合的对策,如列宁所讲:“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家的现象和各民族间的任何隔离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互相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为一体。”(列宁,1987:503)众所周知,无产阶级革命从来都是国际性的,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马克思主义并不赞成用国际主义来替代和否定民族主义,而是主张以积极的民族主义来逐步实现国际主义,即被压迫民族通过政治和社会革命的方式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获得民族解放,走上民族独立和自决的道路。在现时代,消极的民族主义及其实现方式不但不可能取得民族自决,反而会沦为资本及其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在当今时代,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通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逐渐消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民族、文明冲突问题。

再次,中国道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统一。在布热津斯基、弗兰西斯·福山等新保守主义者以苏联解体为依据宣扬共产主义失败论、历史终极论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凭借制度优越性和理论创新性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陈学明,2012,17),在充分发挥资本的增殖性同时,又以制度的优越性克服资本的异化效应,防范和规避技术的负面隐患,使之保持给人类创造福利的中性角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命运多舛的民族压迫中通过积极的民族主义而走向独立的。它以第三世界为立足点,积极融入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在全面发展生产力的同时,通过和平主义政策来推进世界和平,正在积极建构取代由资本所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国际新秩序,

这是解决当下多元化民族、文明冲突的根本出路。综上所述,中国道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秉持共产主义信仰的完全不同于欧美资本模式的科学发展模式,是守护我们时代的幸福与自由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中心”论形成充分的意识形态自觉。以产能过剩为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由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走向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资本必然也从短缺到过剩,从利润增长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润率必然逐步降低。因此,产能过剩并非相对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是相对于利润率的不断降低。对此,西方采取的是资本输出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由于输入国的人力成本的降低,使资本重新获得了利润,但这一策略必然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走向需求饱和而面临新的危机。这时候过剩的资本就只能转入金融领域,通过周期性地制造金融危机等手段割发展中国家的“羊毛”。与此相反,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只要符合成本核算的基本原则,不会使利润率构成绝对的界限。相反,只要能够保持国有经济的保值增值,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并不构成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危机。如此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将截然不同于以资本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美国、日本、欧盟之所以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非由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市场化不够,而是由于即使其利润率为零,只要生产能够维持工人就业,产品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国有企业就可以组织生产,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企业却必须关门,造成工人失业和社会危机,因此这种竞争对资本主义企业构成强大的压力。这说明,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生产目的的社会主义经济与以利润增长或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相比,具有制度上的优势。这种制度优势的持续扩大恰恰能够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Agnes Heller, 1976, *The Theory of Need in Marx*, London: Allison & Busby Limited, p.23.
- [2] Andre Gorz, 1980, *Ecology as Politics*, South End Press.
- [3] 陈学明, 2012, 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 第 11 期。
- [4] 陈学明, 2014, 论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第 1 期。
- [5] 列宁, 1987, 《社会主义革命与民族自决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 载《列宁论民族问题》,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刘珍英, 2016, 需要结构、财富体系与价值观: 从货币到人的革命, 《天津社会科学》, 第 2 期。
- [7] 马克思, 恩格斯, 199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8] 马克思, 恩格斯, 19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